

# 佛像和我们

□徐兴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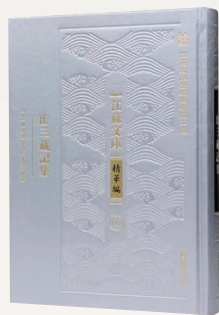
徐兴无  
书 | 话 | 文 | 脉

导读

佛像是人类文化艺术的结晶,中国的佛像伴随着佛教文化中国化的历程,留下许多杰出的作品和生动的故事,更启发人类发现自我的智慧。



《该余丛考》  
[清]赵翼撰 曹光甫点校  
凤凰出版社



《出三藏记集》  
[南朝梁]僧祐撰  
苏晋仁、萧炼子点校  
凤凰出版社



《世说新语》  
[南朝宋]刘义庆撰  
[南朝梁]刘孝标注  
刘强 辑校会评  
凤凰出版社



扫码关注  
江苏文脉公众号



我最初对佛像的印象,是小时候去扬州平山堂玩,大概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法净寺(现在的大明寺)的佛殿尚未开放,父亲抱着我从窗格里看见过殿堂里的金身佛像。后来在南京栖霞山才看到石窟里的佛像。但这些都算不上是大佛,也就是佛教里说的大像。孟子曰:“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孟子·尽心下》)所以,大佛的艺术美对佛教文化的表现力和影响力具有特殊的价值。古代和现代的大佛很多,可惜我游历欠丰,只见过敦煌莫高窟和四川乐山的两尊唐代大佛。今年孟冬,天气晴朗,应邀去无锡灵山参加“天花烂漫——当代中国佛教文化艺术邀请展”的开幕式,因而得以瞻仰平生所见的第三座大佛——屹立于太湖之滨、小灵山之麓的灵山成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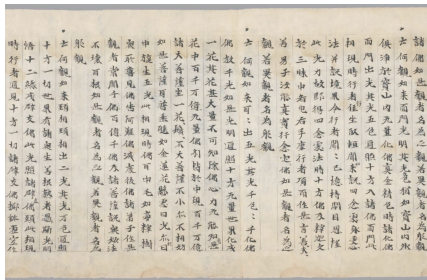
面对这座高达八十八米的东方大佛,我不禁想起艺术哲学家熊秉明先生(1922—2022)写的《佛像和我们》,其中讲述了他是如何将佛像看成艺术的历程。他认为欣赏佛像第一步要排除宗教成见。无论是虔诚礼拜还是视为迷信,都不能将佛像“从宗教的庙堂里窃取出来,放入艺术的庙堂里去”。第二步要排除艺术成见,不能用“像不像真人的写实观点去衡量佛像”。第三步,“我们不能忘记这究竟是一尊佛”,还要再去了解宗教,才能欣赏佛像艺术如何表现其“圆满自足的佛性”。总之,要从艺术和文化入手,才能观看佛像的美。熊秉明先生出生于南京,1984年他以巴黎第三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主任的身份来南京大学做过两场关于中国书法和西方现代艺术的讲座,至今我还保留着当时听讲的笔记,记得他说的话:“只有懂,才能欣赏,才能喜欢或不喜欢。”

如果我们对灵山成佛作如是观,就要将他看成一个佛教题材的大型雕塑艺术作品。不过与古代的大佛不同,这座青铜大佛和许多用现代工业与科技文明铸造的巨型塑像一样,可以不依自然的山体岩石,不受蔽于庙宇佛塔,独立于天地之间,这样便断然别除了古代大佛的自然感和沧桑感,让你更加直接、纯粹地感受一个超自然巨大形体的自在性,从而被它震撼。

众所周知,早期的佛教主要崇奉佛骨、佛塔,是没有佛像的。清代赵翼(1727—1814,江苏常州人)《陔余丛考》“塑像”认为“塑像实不自佛家始。”但他错误地认为“佛像自汉武帝击匈奴,始得其祭天金人以归”。西汉霍去病击败匈奴,“收休屠祭天金人”。(《史记·卫将军霍去病传》)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张婴云:“佛徒祠金人也。”这大概都是佛像传入后,中国人的想象之辞。汉武帝击败匈奴是公元前二世纪的事,而佛像则起源公元一世纪后半叶的古印度犍陀罗地区(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地区),当时月氏人在此建立贵霜王朝,弘扬佛教。中国古代两位西行求法的高僧,东晋的法显和唐代的玄奘都曾到过那里。而这个地区曾被希腊马其顿王国征服过,因此希腊文明与南亚文明得以交融,古希腊的雕塑艺术与大乘佛教共同创造了犍陀罗的佛像艺术。因此我们看到的犍陀罗佛像都带有古希腊的风格,直到公元二世纪至四世纪的笈多王朝才形成印度风格的佛像,此时正值中国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像便随着佛教进入了中国。

大概中国的古书中出现佛像的时间是公元一世纪中期至二世纪,即《后汉书》中记载东汉明帝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楚王英修浮屠祠,“浮屠者,佛也”,“佛身长一丈六尺,黄金色,项中佩日月光。”又载“(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项有日月光……遂于中国而图其形像焉”。《后汉书》载东汉桓帝(147—167在位)“设华盖以祠浮屠、老子”。而中国境内最早的考古实物,过去认为是开凿于三世纪左右的新疆克孜尔石窟等,2021年在陕西咸阳成任村东汉墓地出土了两尊带有犍陀罗风格金铜佛像,大约在二世纪后半叶至三世纪。

开窟塑像是为了僧人信众们通过观看佛像修习禅法,所谓“谛观像好”,与佛合一,去除恶念。东晋时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罗翻译的汉文佛经《佛说观佛三昧海经》,专讲佛的诸多宝相和观相之法,其中说:“佛告阿难。如来有三十二大人相八十种随形好,金色光明……如是等人。若能至心一日一夜思念在前。观佛如来一相好者。诸恶罪障皆悉灭尽。”随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写本P2078《佛说观佛三昧海经》卷第四(局部)

着佛教的传播,南北朝至隋唐,中国的北方和四川地区开凿了许多石窟和大佛,而长江下游地区仅南京栖霞山和浙江剡(shàn)溪两处。学界一般认为这是南北佛教风格的不同,宿白先生(1922—2018)《中国佛教石窟寺遗迹——3至8世纪中国佛教考古学》认为:

316年西晋覆灭,魏晋谈玄之风随大批汉族士族南来而盛于江左,此后南方佛教依附玄学,偏重义理高谈阔论,与北方地区重视宗教行为者有别,故唐僧神清于《北山录》中评南北佛教云:“宋风尚华,魏风犹淳。”高华重言辞,风淳重实行。所以北方地区除新建寺院外,多开窟备禅行,而江左则仅于寺院致礼、讲论,其坐禅也重在法堂之内,其念佛三昧示“洗心法堂”,所以不重石窟。

偏重义理就要重视思想学说、高僧和佛教文献,“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僧祐《弘明集序》)这需要比较高的文化程度。南方佛教酝酿出了一些重要的中国佛教宗派,比如东晋慧远在庐山创立的净土宗,陈、隋之际智顓(yī)在天台山创立的天台宗,法朗、吉藏,在栖霞山创立的三论宗等。现存最早的佛教传记集《高僧传》(亦名《梁高僧传》)由梁代慧皎编撰,记叙了汉代至梁代两百五十多位高僧的事迹,开创了后世《高僧传》的佛教史书形式。最早的女性僧侣传记《比丘尼传》由梁代僧人宝唱编撰,记叙了晋、宋、齐、梁六十多位比丘尼的事迹。

南方佛教对佛教文献特别重视。中国佛教史上最早的《大藏经》编纂于梁代。《隋书·经籍志》曰:“梁武帝(帝)大崇佛法,于华林园中,总集释氏经典,凡五千四百卷。沙门宝唱撰《经目录》。”最早的佛经目录是梁代僧祐编撰的《出三藏记集》,著录佛经十二类两千一百六十多部。他还编纂了中国第一部佛学论文学《弘明集》,收录东汉至齐梁五十多篇阐扬佛教及与儒家、道家辩论的文章。僧祐(445—518)生于建康(今南京),小时候就喜欢到建初寺拜佛,长大得知父母为他定了亲,就逃到钟山定林寺出了家,成为学问渊深、受到朝野尊敬的高僧。宝唱和文学理论家、《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都是他的弟子。《高僧传》卷十一《僧祐传》记载他的墓碑是刘勰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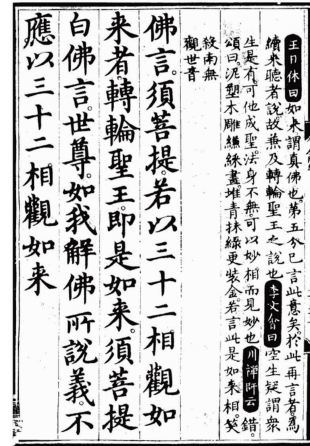
有趣的是,尽管南朝佛教不重开窟造像,但佛像艺术也很发达。僧祐就是个造像大师。《高僧传》卷十三《僧祐传》记载僧祐居剡溪石城山隐岳寺,见寺北有青石壁直上数十丈,中有佛光,遂发愿开凿佛像,仅雕成面部,便遭病身亡。后来僧祐受梁武帝敕命前往督造,他发现僧祐造像时,“凿龕过浅,乃铲入五丈,更施项髻”,从天监十二年春至十五年春就造成“坐躯高五丈,立形十丈”的大佛。同卷《法悦传》记载法悦和智靖铸造丈八无量寿佛铜像,尚未完工,两位僧人就相继迁化了。于是梁武帝又敕命僧祐督造完成。还有戴逵和戴颙(yóng)父子,也是绘写和雕塑佛像的名家。《世说新语·识鉴》载:“戴安道(逵)年十余岁,在瓦官寺画。王长史(濛)见之曰:‘此童非徒能画,亦终当致名。恨吾老,不见其盛耳!’”《高僧传》卷十三《慧力传》记瓦官寺佛像:

有戴安道所制五像,及颙所治丈六金像。昔铸像初成,而面首殊瘦,诸工无如之何。乃迎颙看之。颙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既颙(lù)减臂胛,而面相自满,诸工无不叹息。此事又见载于《宋书·戴颙传》。又唐李肇《尚书故实》曰:

佛像本胡夷朴陋,人不生敬。今之藻绘雕刻,自戴颙始也。颙尝刻一像,自隐帐中,听人臧否,随而改之。如是者积十年,厥功方就。



犍陀罗释迦牟尼雕像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博物馆藏



明永乐内府刻本  
朱棣《金刚经集注》  
书影

到了唐代,中国禅宗由六祖慧能发明宗旨。禅宗主张在自己身上寻找佛性,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印证,所谓“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佛性既然不在文字中寻求,更无需在佛像中观看。禅宗奉行的主要经典《金刚经》中,佛教导师须菩提提“不可以三十二相相见如来”,因为“如来说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所以,佛具有的“三十二大人相”不过是名称符号,而不是本真的佛性。明成祖朱棣御注《金刚经集注》中引了南宋道川禅师描写佛像的诗句:

泥塑木雕绿线画,堆青抹绿更装金。若言此是如来相,笑杀南海观世音。

当然,禅宗并不是否定经典与艺术,而是反思我们诵读佛经、观赏佛像是为了什么,因而启发我们以一种更大的智慧看待文化和艺术。上大学时,我读了一些讲佛学的书,似懂非懂。假期回扬州,曾经去高旻寺访问住持德林长老(1914—2015),他是临济宗的传人。记得我问他如何证明佛性无处不在,他指着院子里的树,说可以雕成无数个佛像。后来我才明白这就是“翠竹黄花皆佛性”(唐司空图诗句)的道理。所以,超然而自在的灵山大佛就是我们每个普通人的身影,是大写的人。倘若按照禅宗的观念来看观灵山大佛,还是《西游记》中孙悟空引用鸟巢禅师《多心经》的偈语说得最好:

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宝塔,好在灵山塔下修。